

X55541

A L

384412

芦荟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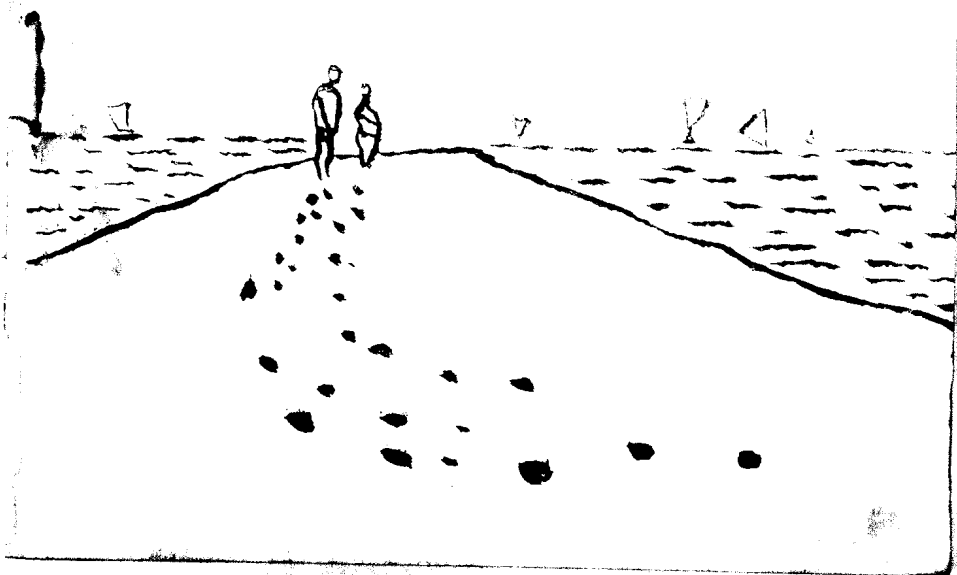
47.554
〔索马里〕F·M·J·奥勒 著



41
L

芦荟恋歌

[索马里] F·M·J·奥勒 著



IGNORANCE IS THE ENEMY
OF LOVE

Faarax M. J. Cawl

Copyright © Faarax M. J. Cawl, 1974

English Copyright © Zed Press, 1982

(本书原是索马里著名作家 F·M·J·奥勒用索马里文创作,1974 年出版,
B·W·安德泽尤斯基译成英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非洲文学代表作之一。
中文本是根据伦敦泽德出版社 1982 年版译)

封面设计: 李 可 克

芦荟恋歌

〔索马里〕F·M·J·奥勒 著

梁丙添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4.125 插页:1 字数:89,000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4,000

书号: 7003·103 定价:0.59 元

赠 言

我把此书献给那些

将要学习祖国语言的未来的男女青年。

他们将没有我们所遭受的那种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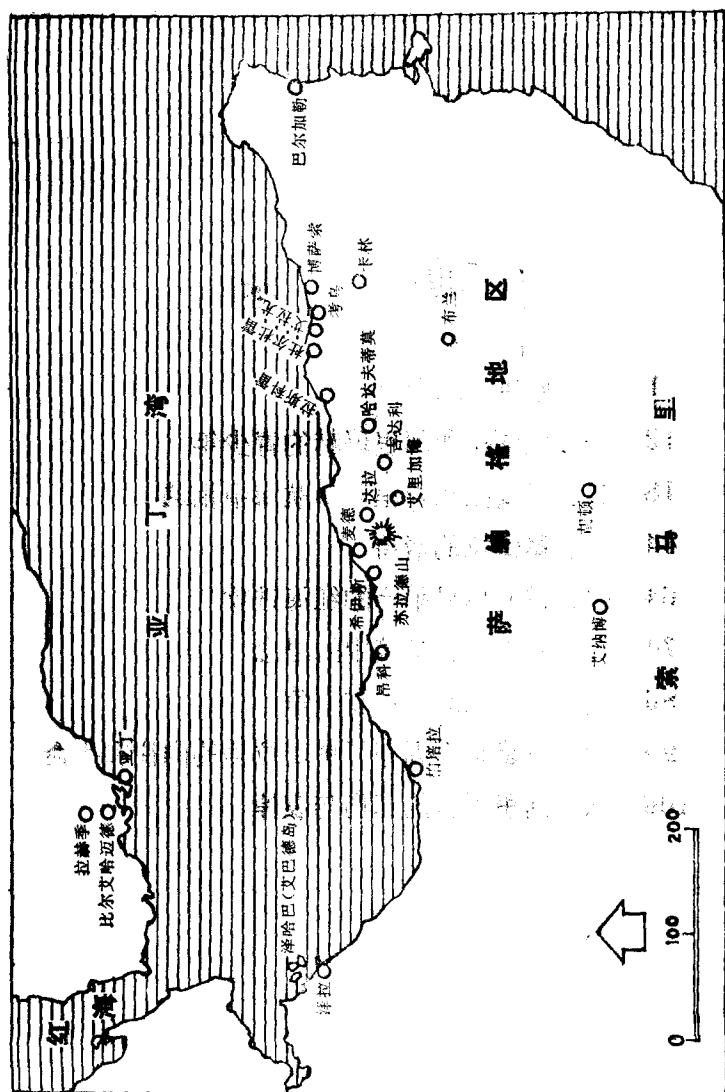
象参天大树那样高深的苦难。

他们的文化遗产

将是永恒的遗产。

真主啊，

让他们从书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吧！



目

录

- 1 原译者的引言
- 12 一、奥蕾拉和阿里玛赫的青少年
- 18 二、奥蕾拉和阿里玛赫航海中相遇
- 44 三、奥蕾拉的情诗
- 64 四、穆斯林兄弟会的红海进攻
- 74 五、阿里玛赫险境中的思念
- 86 六、奥蕾拉的反抗和斗争
- 99 七、封建魔王剥夺了奥蕾拉美的向往和生命
- 106 八、阿里玛赫的悲伤与哀悼

原译者^①的引言

社会历史背景

这里所讲的故事虽然以小说形式出现，但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书中的男主人公阿里·穆罕默德·哈桑，人们一般称他为阿里玛赫，意即“阿里水手”。他和女主人公奥蕾拉·巴雷一样，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他们俩一生的遭遇，至今还留在索马里萨纳格地区的老人的记忆中。作者在小说中使用了老人口头提供的素材，并在这个基本框框内构造了细节和对话。

故事情节是围绕着本世纪头三十年索马里民族历史的背景而展开的。当时，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成员（他们自称是“伊斯兰托钵僧”），正在同那些瓜分索马里领土的外国列强以及那些接受殖民统治的本国人进行斗争^②。这场斗争的领导者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1856—1921），他是一名穆斯林复兴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又是一个民族主义领袖。人们习惯地叫他赛义德，意即“师主”，敌人则送给他一个

① 原译者是 B. W. 安德泽尤斯基，是从索马里文译成英文，1982年出版。

——中文本译者

②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曾在索马里沿岸侵扰。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对索北部沿海地区入侵和瓜分。1887年7月索北部沦为英“保护地”。1889年—1920年索马里人民在民族英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领导下进行持续20年之久的反英殖民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

——中文本译者

轻蔑性的浑号——“疯毛拉”。他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的组织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一生中颇有建树，指挥了一个效率很高的军事情报网和一支组织严密、后勤补给充足的精兵。他用兵如神，擅于发动突然袭击。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能驾驭部族间的联合和敌对行动，同时又努力把全体索马里人民团结起来。虽然他只是在小说中的一个场面出现，但他进攻亚丁英国驻军的计划，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影响着男女主人公一生的活动。

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象奥蕾拉和阿里玛赫两人的故事一样，是以口头传说为基础，而不是依据文献资料。这两种资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尽管在细枝末节上并非全然如此：从我目前所能查到的材料来看，在英国的文献资料（如殖民和军事方面的函件和记载）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实存在着一个进攻亚丁的计划，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否定这一说法。赛义德作为一个足智多谋、富于创造精神的战略家，是完全有可能作出这个决定的，特别是因为亚丁非常接近奥斯曼帝国的前哨阵地。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强国，当时正在与大不列颠作战。要是研究一下土耳其国家文献中有关索马里的资料（恐怕从来也没有人研究过），就很可能找到一些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线索。

作者非常注意政治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也非常注意特定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史实的可靠性。每当谈到交通联络的方法，人们的衣食住行，陆上和海上的救生技术，以及那些岁月里盛行的各种迷信思想，作者都特别谨慎，使之准确无误。当时有一种特别的生活现象，它对故事情节十分重要，那就是传递口信和函件的方式；这个国家那时没有邮政、电话、电报等公共设施，广大人民都是文盲，这样，由旅行者或特别信使

来传送口信和函件便成了通讯联络的主要手段。如果有谁往外寄信或者收到信件，而又不会读和写，那么他就得求助于能读能写的人。因此，要做到保守通信的绝对秘密是不可能的。

在小说的其它情节里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普遍迷信星体对人的命运具有影响，认为利用星辰来洞察事物和预卜未来是可能的。人们还相信，假如那些体弱多病、孤苦伶仃的人请求帮助而又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可以用咒语使体格强壮的人蒙受灾难。女主人公似乎在某处暗示了这样一种威胁，而男主人公确实把它看作是他的一切不幸的根由。

诗歌的运用

小说中所描绘的、很可能使外国读者感到奇特的生活画面，就是使用口头诗歌作为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的媒介。看到书中人物用诗句相互对话，外国读者很可能产生疑问：作者是否沉迷于某种标新立异的文学尝试？然而，对于索马里读者来说，诗歌形式的对话则给人以一种特定时期的真实感。因为索马里人（包括市民）都知道，在昔日的传统生活里，诗歌是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到处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在那个时期里，一段叙述如果没有插进一些诗句，就会显得奇怪和不真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口头诗歌被当作一件宣传武器，用于部族间的政治和国家的政治。它可以给冲突地区带来和平；它可以在建立新联盟和振兴旧联盟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可以用来赞扬或批评朋友和敌手。诗歌还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尤其是诗人们“对诗”的时候。这种“对诗”活动往往是在

专门组织的集会上进行，有时是在旅行者当中比试。旅行者们常常远途跋涉，带着函件或口信，来往于交战中的部族之间。

然而，诗歌并非只限于公共场合。它可以在部族或家庭里使用，也可以在夫妻或朋友间使用；它既可以用于冲突的气氛，也可以用于和睦的气氛。由于习惯的缘故，诗歌表达的意见在语气上要比普通语言所表达的意见强烈得多。人们可以用很尖锐的诗句相互取笑，但不会引起对方的怒骂。你也可以用许多优美的诗句夸奖别人，甚至还可以自吹自擂。否则，说出来的话就显得很不自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索马里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部族间战争的停息，使诗歌在个人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遭到破坏，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可以说，处处诗歌声的黄金时代——每个社会都可能有一个值得怀念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幻想概念。但是，索马里人和外国人在研究和批判性的分析中，已经获得许多证据（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证实索马里口头诗歌在不久的过去曾经起过作用。特别是，人们对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他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口头诗人）把诗歌当作宣传鼓动的手段一事进行了大量研究。赛义德的反对者所创作的诗歌，有许多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诗歌同赛义德的诗歌互相吻合，这使口头诗歌的历史真实性更加可信。

小说中的大部分诗歌是作者根据传统诗体创作的，但也有一些摘引自其他诗人。对于这些摘引的诗句，作者在注脚里作了说明。在这个译本里，我把作者的注脚移进我的注释，因为它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注解，否则外国读者就读不懂。还有几首诗歌，据说是奥蕾拉、阿里玛赫，以及书中次要人物努

尔·西伊塞和达勒马·巴雷这些真人所作；作者对他们的诗歌并没有一一查证，但我在注释里也对它们作了说明。

在工业发达、文化先进的国家里，口头诗歌已经不多，而且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对口头诗歌的总现象不怎么了解的读者也许会问：口头诗歌怎么可能历尽沧桑、保存至今呢？一首口头诗歌又怎么可能被确定为某个诗人的作品呢？答案在于严格的社会俗规（这些俗规支配了索马里诗歌艺术的发展），还在于严格的诗律和行韵。首先必须强调说明的是，索马里诗人和诗歌朗诵者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这与其他一些口头文化完全两样。谁都无法单独组成一个职业团体。他们获得的报酬通常只是声誉、热情招待和节日礼品。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诗人，有才华的诗人拥有热心的听众。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是世间少见的，诗人的作品总是反映他们的生活或大众的生活的某一特定情景。人们兴致勃勃地倾听诗歌朗诵，了解到事态的发展情况以及诗人或他们代表的团体所采取的立场态度，从中可以得到智和美的享受。

保存和传播口头诗歌原文是诗歌朗诵者的任务；他们当中有些人本身也许就是不很出名的诗人，但他们的主要才能在于熟记诗歌。他们从小反复练习，逐渐练就了这种本领。为了赢得承认和声誉，他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整地重述诗人的话语；无论是从最初表演中听来的，还是从其他诗歌朗诵者那里听来的，他们都必须做到一字不漏。谁都得忠实于原作，都得按规定办事。在人的记忆力的限度之内，谁也不准改变或增删口头诗歌原文——这是大家对他们的信任。同时，还存在一条不成文的版权法，这条版权法规定诗歌朗诵者必须宣报诗人的名字。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通常需要谈谈

诗歌最初创作和朗诵的情况，除非朗诵者完全相信听众掌握了这种背景知识。比较古老的诗歌，或者来自索马里边远地区的诗歌，往往通过这些朗诵者的讲解而得到传播。通过掌握这种知识，许多朗诵者也都成为口头历史学家。实际上，历史故事和诗歌的作用常常被弄颠倒了，在讲述历史故事时，诗歌仅仅起着解释和证实的作用。本书中插入的诗歌，就说明了这一点。

朗诵者逐字逐句地背记诗歌的任务是很艰难的，幸亏很长的诗歌并不多见，一般的诗歌约有 150 行，很少有超过 300 行的。这些诗歌的特点是：韵律严谨，诗体繁多。

我在书中翻译的索马里口头诗歌虽然用的是过去时态，但读者不要以为这种艺术已被完全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口头诗歌仍然继续发展着，电台广播诗歌的时间是很多的。随着文化技术的传播，即使在游牧内地，口头诗歌也必然被记录下来。诗歌朗诵者日益依靠录音带来帮助他们记忆。

1972 年以前，索马里没有官方文字。虽然也存在过一些私家书写方法，但它们只是在很少一部分人当中使用。那时索马里出版的几种文学读物，几乎全是口头诗歌和故事的手抄本，书中一般都附有引言和注释。这些读物的编辑所关心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国家的文化遗产，但常常也是为了宣传他们使用的特别书写方法。1945 年以后，索马里显然迫切需要一种索马里文字，许多人深深感到这一点。可是，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强烈情绪，妨碍了达成一项关于创立文字的协议。最后，人们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文字：拉丁文，阿拉伯文和索马里文（新创造的文字）。每种文字的提倡者都固执己见，这个僵局 1969 年革命后才被打破。1972 年，拉丁字母表得到采用，索马里语成了国家的官方语言，取代了过去殖

民强国大不列颠和意大利的语言。在此之前，英语和意大利语曾经广泛地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小说的改良主义思想

《奥蕾拉》^①出现于1974年，是索马里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74年以前只出版过两篇小册子形式的小说，而且它们的篇幅比《奥蕾拉》短得多。《奥蕾拉》的出版，正值城乡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教育制度正在迅速地实现索马里化。虽然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对邪恶的愚昧无知的攻击，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切中要害的。事实上，它受到大批刚刚获得文化知识的人们的欢迎，无疑对扫盲运动的胜利起了促进作用。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纯粹以本国文化为基础的读物，让人们得到美的享受。法拉赫·M·J·奥勒在全国享有盛名，他的成功鼓舞了其他有才华的索马里作家。在官方文字问世后的短短几年里，索马里的诗歌和散文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法拉赫·M·J·奥勒的改良主义热忱，不仅仅限于他提倡人们学习文化知识。他在小说里描绘了一幅非常令人同情的索马里妇女的画面，这幅画面含蓄地表明他对妇女解放的完全支持。这又与1969年上台的政府的观点相吻合。小说出版的时候，政府正在起草家庭法，这个家庭法势必遭到某些传统观念的强烈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是1969年以前的索马里妇女，总的来说可能比其他许多男性统治的社会的妇女好一些。索马里妇女的艰难，当然是由于

① 本书索马里文版原名《奥蕾拉》。——中文本译者

社会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残酷所致，但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制度遭到践踏而造成的。譬如，除了若干城镇少数家庭出于传统习惯外，妇女不是非戴面纱不可的。全国的妇女都有较多的行动自由，小说中的几名妇女能够独自从亚丁前往索马里，就是一个明证。索马里的男人一般都十分尊敬和钟爱他们的母亲。因此，许多富有个性的能干的妇女，对家庭事务有很大影响；她们甚至通过操纵家里的男成员，对公共事务也施加很大影响。婚姻通常由双方家庭来包办。年轻情侣相一下面，接触接触，婚事就确定下来了。这种风俗未必会带来什么问题。不过，私奔被认为是年轻人自主婚事的一种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都遭到双方家庭的追捕。但是，假如他们设法逃出一定距离而不被抓获，他们就被允许结婚。这就是为什么奥蕾拉——小说的女主人公——相信阿里玛赫将会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原因。向女方家庭付聘金的习俗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因为这种做法涉及到两个家庭相互之间的社会义务。如果结婚后一段时间内，事情都很顺利，一部分聘金就回到丈夫那里。这样，聘金就象是一种储蓄，可以帮助丈夫获得好名声。此外，彩礼的数量不但反映出男女双方家庭的威望，而且反映出女子的身价。

由于贫穷和贪婪，年轻女子往往被迫嫁给年迈、残暴、可憎的男人。这些男人为了弄到妻子，可以付给一份很吸引人的彩礼。传统习俗遭到了践踏。小说所描写的情景就是如此——请不要忘记，它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法拉赫·M·J·奥勒用同情的笔调对这个主题作了处理，使之反映出索马里年轻一代的许多男女的情感。他们对政府倡导的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改革是支持的。

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忘记支持另一种对国家经济发展

十分重要的事业。他让小说的男主人公出来反对一种偏见，即许多索马里人不同意吃鱼。尽管国家有很长的海岸线，鱼类很丰富，但人们认为，同农村广大群众的肉食相比较，鱼是一种很低劣的食物。政府正在通过报界和教育来劝说人们吃鱼，设法克服营养不良的问题。

法拉赫·M·J·奥勒在小说前面写的《赠言》是献给索马里的下一代的。鉴于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索马里文的创立又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赠言》中的期望定将变成现实。过去，外国语言的使用，几乎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造了许多实际困难，剥夺了广大群众获得知识的机会，使那些有创造才华的人不能用祖国语言为本国人民写作。作者的这本书所奉献的新的一代将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如今，大学前的整个教育系统，都采用索马里文作为教学媒介。年轻人用本国语言学习高等数学和科学，他们甚至不可能完全理解愚昧无知曾经给他们的祖辈带来的痛苦，除非他们从历史资料以及象《奥蕾拉》这样的小说中获得启示。

在《赠言》后面的一页里，读者可以看到一句格言。这是从第二章摘录出来的，它清楚地表明了小说的大声疾呼的改良主义思想。

小说的作者

象大多数索马里作家一样，法拉赫·M·J·奥勒不是一位职业作家。他生于1937年，先是在索马里的哈盖萨贸易学校接受教育，然后获得一项奖学金，到伦敦的切尔西航空车辆管理学院就学(1959—1962)。回国后，他起初是一名技术教导员，1964年参加了索马里警察部队，在那里负责汽车运

输,获得中校军衔。正巧,除了日常事务外,索马里的警察还有一个为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经常参预居民的福利和发展计划。

1979年,法拉赫·M·J·奥勒当上国家运输公司的第二把手,成了公司的总经理。尽管他责任繁重,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写作第二部小说《殖民主义的枷锁》(1978年在摩加迪沙发表)。他在这本书里进一步发展了他穿插诗歌和广泛运用口传历史资料的技巧。他通过自己所作的研究,以及同摩加迪沙的索马里艺术科学院的学者们的接触,对口头诗歌和口传历史资料产生了极大兴趣。一旦有空,他就跑到内地乡村去,因为那里的口头诗歌和传统习俗遭受破坏的程度最小。

小说的翻译和注释

我希望译文能高度忠实于原文,因此我没有随意乱译,即使有些地方本来可以使译文易懂一些,或者可以使它符合一本英文小说应有的某种设想的水平。特别是,我注意保留口头诗歌的意象,没有试图去模仿原诗的行韵手法,更没有去模仿原诗的格律式样。英语和索马里语两者的音位结构和句法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模仿起来,就势必产生一种稀奇古怪的效果,使词语的选择和排列显得牵强附会。

读者可能对书中的一些写作手法感到奇怪,尤其是第一章的说教式的口气,那里罗列了许多枯燥无味的山脉名字;作者在其他几个段落里有时也充当教师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小说赢得索马里语地区的尽可能多的读者,因为这些读者当中有许多人可能对故事发生的地区不怎么了解,城里长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对许多传统习俗不怎么熟悉。

读者有时会感到纳闷，觉得法拉赫·M·J·奥勒象是对外国听众讲话，因为他引用谚语时这样说：“我们索马里人说”，或者“有一句索马里民谚说道”。这些只是惯用语句而已，但也恰恰说明索马里人民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典型的自豪感。

我相信，人们不用借助注释便可读懂和欣赏这部小说；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起初是单相思，后来是两相思，但为时太晚了。如果你想对小说的背景有较深的理解，你将会发现注释对你有所帮助。